

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理论发展溯源

□ 金 立

一、早期理论渊源

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英国。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的颁布正式宣告了国家对劳动者安全保障问题的介入。19世纪末在德国建立的现代社会保险方式的雏形,标志着社会保障开始走上国家化、社会化的轨道,为以后许多国家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基础。

虽然正式的社保制度的建立时间不过百年,但其理论渊源却溯及遥远。首先,欧洲在3000多年前便有了互助互济的道德观念。早在2000年前,古巴比伦国王就曾命令僧侣、法官和市长向其所管辖的地区居民征收特别赋税,以筹集重灾救济基金。同时,作为西方文化基石、精神内核的基督教,其教义中明确反对富人对穷人的剥削,主张建立大家平等、普遍幸福的千年王国。这些传统的慈善道德思想,虽然琐碎、零乱,但经过长久文明的锤炼,无疑为“国家社会对公民的生存权负有义务”的观念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和矛盾的累积,空想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及社会改良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唤醒人民为争取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同时,对建立未来人类理想社会组织形式提出了许多积极的设想。其中充满了大量有关社会福利的闪光思想,较全面、系统、深刻地显示了社会保障理念在未来完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为后世推动社会改革,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持。

二、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理论

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德国从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落后的国家走向统一。在此背景下,主张加快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历史学派诞生了,他们的理论得到了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政府的重视和采纳,

成为德国首先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理论依据。新历史学派的主张有:

1. 国家的职责除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发挥军事威力外,还有一个“文化和福利”的目的。国家应兴办一部分公共事业来改善国民生活,改善公共卫生,改善人民生活环境。

2. 国家具有管理经济的职能,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极为重要。他们认为劳工问题是德意志帝国面临的最严峻问题。针对工人在就业、劳保等方面面临的问题,新历史学派主张国家通过立法,实行包括社会保险、孤寡救济、劳资合作以至工厂监督等在内的一系列干预措施,调剂再分配渠道,在不触动资本家利益的情况下实行社会改良,缓和阶级矛盾。

3. 国家的法律、法规、法令至上,并决定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不能只依赖于法律,因为经济组织是为伦理道德所制约的一种秩序,经济的发展还要同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

三、费边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

费边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学者针对当时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提出的两种不同的解决思路。费边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文学家萧伯纳和社会学家韦伯夫妇。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害怕阶级斗争,希望通过改良来完善资本主义。该学派认为:个人必须为社会工作,社会反过来应保证个人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贫富差距不能过大,否则极易损害有机体的效率。每一个个体的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天赋的权力,国家有责任和义务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某种形式的财富再分配来调整自由放任的市场只讲

效率不求公正的状态。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里奇、霍布豪斯、霍布森。该学派反对费边社会主义的改良思想,他们从资本主义内部出发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其理论目标是通过改革建立他们认可的社会主义。该学派认为,必须通过改革扩大每个公民自我发展的机会;由于社会上广泛存在的贫困是财富分配不公平的结果,国家有权且有责任对个人财产权进行干预,使得所有公民都可公平地获得自己应有的那份财产。

四、福利经济学的理论

旧福利经济学是指以庇古为代表,以完全自由竞争为前提,以马歇尔经济学为基石,从福利的观点出发建立的经济理论。该理论主要给出了两大命题:一是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福利也就越大;二是国民收入越平等,社会福利也就越多。在第一个基本命题下,庇古提出生产资料最优配置的问题,主张政府运用经济杠杆,通过财政、税收的调节作用,消除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背离,使国民收入总量增加,从而增加社会福利。从第二个命题出发,他提出收入均等化的问题,认为收入与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成反比,因此,可以采取对富人征收累进税和遗产税、扩大失业补助和社会救济等政策实现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社会福利。庇古的理论成为后来实行普遍福利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

与建立在基数效用论基础上的旧福利经济学相对应的是建立在序数效用论基础上的新福利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勒纳、希克斯、卡尔多、伯格森、萨缪尔森等。新福利经济学的核心是帕累托标准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其对社会保障制度最主要的影响是关于公平与效率的思考。他们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两个互相矛

美日欧农业国内支持与 WTO 农业协议



□单妙霞

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出口竞争是 WTO 农业协议的三大支柱。无论是在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还是在 WTO 农业协议的实施过程中,还是在新一轮农业谈判中,国内支持都是焦点问题之一。美日欧三大经济实体既是农产品贸易的大国,又是国内支持政策的主要使用者,是农业谈判的主导力量。通过对三大经济实体国内支持政策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该问题。

一、国内支持:概念与分类

国内支持不等同于农业补贴:国内支持是指政府通过各种国内政策,以农业和农民为扶持资助对象所进行的各种财政支出措施;农业补贴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对于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农业补贴这个概念几乎涵盖了政府在农业方面的所有支付,宽泛而不精确,不适用于指导具体实施的法律文件。因此部分国内学者建议规范概念,沿用国际通用的“国内支持”概念。

WTO 农业协议框架下的国内支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免于削减承诺的国内支持,对农业产出和贸易不会产生扭曲或仅产生较小扭曲的“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中的例外规定,微量允许、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S&D)、“蓝箱”政策;另一类是要求削减的国内支持,“黄箱”政策(AMS),包括价格支持、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牲畜数量补贴、种子和灌溉等投入补贴、某些有补贴的贷款计划,这些黄箱政策支持通常会农产品产出结构和市场造成明显扭曲。

二、美日欧农业国内支持实施状况评价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国内农产品的生产进行支持,只是力度和手段有所不同,但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日欧三大经济实体。根据 WTO 秘书处的统计资料,成员国通报的基期 AMS 为 1977.2 亿美元,发达国家占 90% 以上,其中欧盟为 923.9 亿美元、日本 354.7 亿美元、美国 238.8 亿美元,三者

盾的政策目标,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当相互协调,不能顾此失彼。福利国家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进行取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应体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五、凯恩斯反危机的理论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使得凯恩斯的主张有了坚实的实践背景。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一书中,他提出以“政府干预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否认萨伊关于“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论断,认为危机的产生是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必须积极干预经济。在刺激消费上,凯恩斯主张国家必须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的影响,通过税制、限定利率及其他手段,刺激平均消费倾向。在刺激投资上,凯恩斯主张国家采取措

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此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凯恩斯还主张必须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行赤字财政,以此直接兴办公共工程,提高社会福利,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抑制经济危机。

凯恩斯的理论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公共政策的主要依据,对采取普遍福利的社会保障起了促进作用。

六、新剑桥学派的理论

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是一种相对激进的理论。它主张回到李嘉图传统的建立以客观价值论为基础,以现代收入分配为中心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琼·罗宾逊、尼·卡尔多、皮·斯拉法。该学派认为,市场经济下,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国家应当采

取包括福利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在措施上,可给低收入家庭以适当的补贴,从而改变他们的贫穷状态;政府出资提高失业者的文化技术水平,以使他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对财产多和收入高的人群实行没收性财产税和累进所得税,以抑制贫富差距;发展公共服务,增加公众的福利,使各阶层之间的收入趋于“均等化”。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虽然因为过于激进而未能现实中得到切实应用,但其中关于推行普遍福利政策的分析还是另辟蹊径,在理论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财政系)